

集聚的现代性与均衡社会的准则*

袁富华

摘要：基于共享同一知识体系的几个社会理论文本，本文对于当代集聚机制和均衡社会准则给出了一个理论分析。不同于福特主义时期的分享、信任、确定和安全感，去管制化与利益动机主导的后福特主义时期的高度现代化导致了经济对社会的脱嵌，传统财富生产分配逻辑让位于社会风险生产分配逻辑，并将不安全、不可持续带入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过程。风险社会凸显了瞄向未来的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作用。从社会活力培育这一可持续发展角度来看，重塑社会价值规范与社会团结机制非常重要。

关键词：集聚 现代性 风险 规范 均衡社会

一、引言

正如本文题目所述，本文立足于高度现代化这个特殊历史背景，重新审视城市化集聚、失衡和均衡社会重建的前提条件。不同于产业区位、增长极等传统分析，集聚现代性主要针对后福特主义时期去管制所导致的风险积累机制及其后果。高度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是风险、不确定与不安全，这些问题源于逐利动机的失控，社会价值回归因此成为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的内在要求。为此，本文遵循规范主义分析方法，关注效率取向、价值取向二者的有机统一在均衡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集聚的现代性。集聚在当代的表现及其运转机制，有着特殊的经济和社会背景。高度现代化的特征是风险，主要有四类。第一类，风险的制度化。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信息技术发展和知识分工深化，导致

[作者简介] 袁富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信箱：fuhua_yuan1@163.com。

* 本文根据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做了修改，对匿名审稿人特此致谢。

“去技能化”、权威多元化以及制度组织的内在不稳定。为了应对高度现代化不断带入的新风险，不得不依赖专家知识对风险进行管控、利用，最终导致剥夺和个体的异化效应（吉登斯，1998a：213—245）。第二类，传统工业化的财富生产分配逻辑，蜕变为后福特主义时期的风险生产分配逻辑。这是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观点。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价值和规范是社会平等理念，与当代风险社会相联系的价值观念是“安全”和风险评估（贝克，2004：51—57）。第三类，生产和消费“过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认为，现代化特征是生产体系经由大众传媒对消费体系进行控制，而消费的不稳定、易变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安全（鲍德里亚，2014：25—26、53）。第四类，逐利动机驱动下的生活、技术和社会加速循环。这是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①的观点。他认为，逐利动机破坏了现代化过程赖以持续推进的条件和机制，在缺失社会价值和社会保护的情况下，效率提升、财富集聚往往伴随着失衡与不确定的更快累积，当代城市化的风险即源于此（罗萨，2015：180—188）。

均衡社会的四个准则。平等、正义、共同体、安全和信任构成社会团结的基础，这个一般原则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具有分析价值的四个准则。第一，承认集聚的公共性和城市作为公共组织存在。这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思想。在他那里，城市不是单纯作为利益追求的磁体而存在。他认为，首要的应该是关注城市作为集聚体的整体作用，也就是被有机联系、社会规范等理念塑造出来的公共属性，用以巩固城市作为财富、知识和文化的容器功能（芒福德，2018：90—107）。第二，承认集聚的社会性和城市作为道德共同体存在。这个认识要归功于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他认为，当今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是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易变的、逃避责任的、社会分化的结构；而恢复那种自然而然的分享、信任、确定和安全感的传统道德共同体，对于社会重建非常重要（鲍曼，2003：69—88）。第三，承认集聚的综合性和城市作为多元福利组合存在。关于道德共同体的重构，福利国家理论倾向于经济社会各部门的协调，以家庭、企业、国家以及中介组织的制度互补能力，促进分享发展、社会稳定。第四，效率、效能与一体化。这是就社会治理角度来说的，重点是通过认同、参与、再分配机制设计，促进治理效能的提高与经济效率的改进。

① 亦有译为哈尔特穆特·罗萨。

社会理论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源于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和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或者理论上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时期的到来，在开启崭新现代化图景的同时，也将新的风险带到高度现代化进程之中。福特主义确立的充分就业、确定预期和福利保障，在信息化、经济服务化、去管制化的变革中受到削弱，风险和不安成为高度现代化的主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利益取向的去管制化，造成了经济增长对社会发展的脱嵌，开启了持续20多年的现代化风险累积大门，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但是，经济与社会再嵌入、再平衡问题也不断受到理论和政策关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认识到风险累积问题，由此也激发了发展模式多样性的理论探索和政策实践，使价值规范与制度保障之于长期社会活力的重要作用受到重视。从认识论角度来看，技术决定论自身问题也引致了思想的反向运动，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相应得到发展。但是本文认为，在看待现代化过程的联系时，应当坚持经济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任何片面倾向都是有问题的。

二、集聚的现代性：四类机制与风险累积

基于人口集聚和分工的城市及其发展，尽管产生较早，但是作为空间、时间和制度的一类特殊综合体，城市化过程的持续加速乃至其成为经济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动力，却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之后，即经历了二战之前的机械化、电气化与二战之后的信息化、智能化四个阶段。^①从过程角度来看，“空间-时间-制度”这三个维度在各自结构和质上的差异、组合与变化，勾勒出经济社会历史各个阶段的城市化特征，这种演化把技术、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赋予城市。

对于图1、图2、图3和图4所展示的四类现代化理论中所包含的社会再生产关系及其内在矛盾，本部分做一个扼要的比较分析，旨在揭示工具行动或利益动机所带来的矛盾与冲突。逐利动机使得集聚脱离了社会规范约束，并成为

^① 关于工业化阶段划分，请参见工业4.0工作组编写，德国联邦教育研究部于2013年9月发布的《把握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实施“工业4.0”攻略的建议》。该报告的中文版本由康金城主编，中国工程院咨询服务中心刘晓龙等供稿。

当代城市化可持续的主要障碍。本部分基于后福特主义时期的高度现代化，分析集聚及其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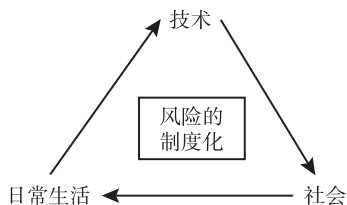


图1 吉登斯现代化理论中的集聚与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吉登斯（1998a, 1998b）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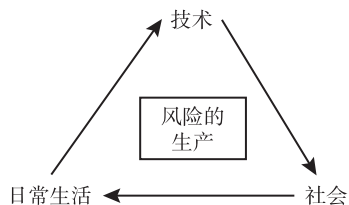


图2 贝克现代化理论中的集聚与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贝克（2004）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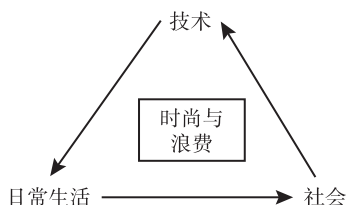


图3 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理论中的集聚与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鲍德里亚（2014）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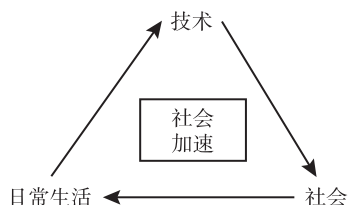


图4 罗萨社会加速理论中的集聚与冲突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罗萨（2015）绘制。

注：图1、图2、图4中箭头方向及其循环，旨在突出能动的个体在反思性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图3是例外，存在技术对被动的消费者的控制，当然，现实中存在日常生活、技术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一）吉登斯：风险的制度化

关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吉登斯的基本认识是：具有能动性的个体在规则与资源的约束和激励下促进社会再生产，并以此获得个体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吉登斯，1998b：61）。因此，高度现代化表现为遵从自身的控制、调节规律，它以信任和安全为基础，但是自身却蕴含了不安全与不稳定。矛盾和冲突源于现代经济社会环境的人造特征，风险的制度化成为集聚现代性的主要标志。

1. 风险的制度化机制。吉登斯的高度现代化指的是我们当今的高度城市化，其动力源于：电子信息技术发展所导致的时空分离与全球化，知识分工

深化所导致的“去技能化”或对专家的依赖，新知识运用于日常生活和制度组织所产生的连续但内在不稳定。^①吉登斯的理论中，个体能动性对知识的运用及其与制度结构的相互作用，把当前的实践与未来预期联系起来，现代化过程不断打开风险前景，并借助专家知识对风险进行管理、监控和利用，从而形成制度化组织起来的风险系统，典型如广泛存在于金融领域、社会保险领域的资本运作、风险分担机构。并且，制度化的风险环境，通过各种途径把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发展机遇和挑战即蕴含在这个动态关联之中，其中，“人造”或“人为”发挥了重要作用。“人造”或“人为”包括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人造的环境。城市的发展导致城乡分割，个体被卷入社会化所决定的复杂系统中。第二，人为设计的生活方式。日常生活越来越受到传媒和专家知识的影响，这些被传递的经验，在为个体增加新知识的同时，也增加了选择的不确定。

2. 矛盾和冲突。与具有明确道德约束和外在规范参考框架的传统社会（如建立在宗教、社区、亲属制度基础上的信仰与信任）不同，高度现代化导致个体对专家系统的过度依赖，因此，各种各样的控制替代了道德约束，知识专业化与道德贫乏共存成为“人造”环境的标志，并造成了个体的两难困境。按照吉登斯（1998a：213—245）的说法，这些矛盾和冲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现代化的剥夺。个体尽管运用知识和规划追求主动的控制，但是受到时空分离和“去技能化”的影响，陷入占有与无力的矛盾之中，面对多样的机会和多元选择，产生无所适从的焦虑。第二，权威多元化加剧不确定。受到知识专业化和其所导致的“去技能化”的影响，权威不再是答疑解惑的标准，专家本身也是受到疑惑激发的。在看待专家见解时，个体通常采取怀疑的态度。第三，标准化和异化效应。商品化、标准化制约个体的选择，并作为控制方式渗透日常生活，个体调整、适应以建立这种人造环境下的生活方式，典型如广告传媒对生活风格和人格的塑造，技术控制大有取代道德规范的趋势。

^① 即吉登斯（1998a：22）所谓现代性的三个动力：时空分离、抽离化机制（包括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两种类型）和制度反思性。其中，知识分工专业化导致的“去技能化”问题或复杂知识的依赖链条的出现，不只是因为外行对专业知识不甚了了，更因为专家之间对对方的知识感到陌生。

（二）贝克：风险的生产和分配

现代化思想上，贝克与吉登斯的理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相互渗透，如他们都认同现代性是一种风险文化。贝克承认现代化正变得具有反思意义，即正在成为它自身的主题和问题，这种思想与前文吉登斯关于高度现代化的思想一致。贝克对风险社会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一个系统分析，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他的主要认识是：后福特主义时期的技术进步和对利益的追求，促成风险社会的产生，社会正由传统收入不平等转变为风险地位不平等，并且影响到每一个家庭和个体（贝克，2004：15—102）。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高度现代化的社会以自身组织为前提，日益变得不稳定，围绕风险界定过程中的机会，各个利益集团展开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斗争。

1. 风险的集聚机制。工业的过度发展和全球化趋势，使得高度现代化社会演变为风险社会。20世纪前后两个半期的鲜明对比是，传统工业化的“财富”生产分配逻辑正在蜕变为风险生产分配逻辑。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对财富的累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风险累积，风险计算、风险界定和风险不平等成为新的商品化主导因素。贝克（2004：15—57）对此有三个深入考察的观点。第一，与传统工业社会风险所具有的职业、空间局限性不同，当代的风险在分工精细的知识里可以改变、转变、削减或夸大，也可以根据利益需要而人为建构。界定风险成为一种权力。第二，风险界定的权利的运作导致不同于传统财富不平等的风险地位不平等，在风险分配中，一些人可能会受到更大影响。通常的情况是，财富在上等阶层集聚，风险在下等阶层集聚，但是，下层的风险累积迟早会传导到整个社会，且在全球化时代，风险社会向他国溢出导致风险地位的国际不平等。第三，从赢家的角度看，风险中蕴含商机，这种机制类似于吉登斯理论中通过风险制度化捕捉利益。未来的发展总是伴随风险，高度现代化中的经济因此变成以利益为动力的风险—技术因果链，从而忽视了其他的社会需求。因此，商业化对规范和政治保障造成了巨大冲击，使工业民主变得虚弱不堪。

2. 矛盾与冲突。从贝克的一些主要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当代风险社会规范约束缺失的担忧。由于风险界定受到了利益的操控，冲突、竞争制约了风险评估的实验逻辑和科学根基，因此社会对专家知识的信任崩

溃。在与传统社会的比较中，贝克（2004：15—57）认为高度现代化的社会是一种科学社会、媒体社会、信息社会的复杂综合体。传统社会与平等理念相关联，风险社会与“安全”理念相关联；传统社会生产分配的价值体系被当代注重安全和风险的价值体系替代，即人们不再关注如何获得“好的”东西而是关注如何避免“坏的”事情，社会变迁目标从以前的进取型变为现在的消极防御型。总之，贝克认为，发达资本主义从自己内生的风险中得到滋养，创造了社会的风险地位、集团利益，同时也唤起了对现代化稳定基础的广泛质疑。

（三）鲍德里亚：生产和消费“过时”

在吉登斯和贝克关于消费需求的分析中，隐约可见鲍德里亚的类似思想甚至影响。鲍德里亚作为比吉登斯和贝克稍早一些的理论家，他的消费社会理论直接受到了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的影响，特别是在生产控制消费这个核心理论层面。关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鲍德里亚（2014：25—26、45—46）的基本认识是：以大众传媒对时尚、大众消费的控制为媒介，资本主义生产并不是依据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耐用性，而是建立在“过时”基础之上，并据之制造了从属于生产增长自身的消耗（而非消费）模式。因此，现代化的特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通过传媒对消费实施控制，消费成为生产的延伸且导致消费地位分化，“人造”的时尚需求蕴含了不安全与增长不稳定。城市化集聚被消费需求的快速扩大主导，集聚造成增长的恶性循环，即为了维持生产和利润，资本主义体制不得不以各种形式的危害、浪费和不安全感为代价。

1. 风险的集聚机制。鲍德里亚（2014：25—26）解释了现代化过程中由于生产垄断和逐利动机所导致的一种消费异化、“非真实化”的极端情景。这种情景隐含着这样一个重要含义：资本主义体制自身替代了社会价值，生产通过广告人为地制造消费地位区分、激发攀比冲动，由此不断生产出“过时”这种不稳定的消费生产力，消费的易变影响到职业安全，流动的社会变成不稳定、不安全的社会。这一切都源于资本主义体制的两个特征：颠倒的序列和消费差异化需求。首先，鲍德里亚同意加尔布雷思的观点：当代资本主义矛盾，不再是企业层面上利润最大化与生产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技术加

速层次上无限的生产潜力与销售市场之间的矛盾。^① 为了实现技术潜力、维护企业垄断地位，生产者乃至资本主义体制不仅要控制机器而且要控制消费，于是就产生了与传统消费者统治理念不同的“颠倒了的序列”：主动权由生产者掌握并通过大众传媒培养生产需要的消费态度和信念。其次，鲍德里亚（2014：49—68）对此更进一步的理论创造是：所有这一切把物质增长的社会变成了物质丰裕社会的对立面，生产秩序安排的目的只为了让消费者需求适应生产需要，使消费者没有独立的需求，只有生产者的增长需求，由此导致丰裕社会的悖论——消费者心理的贫困化。再次，鲍德里亚认为这种贫困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整个消费需求体系成为生产体系的产物，需求并不与相关的物品直接关联，不是一个接着一个产生的物的消费，而是作为消费生产力和生产体系总体的支配权力存在的，因此，技术结构的支配范围扩大了。第二，技术支配扩大的重要依托，是将广告这个在消费社会具有战略意义的工具配给了生产体系，通过广告的宣传、包装等功能，人为设计消费的等级划分，以此创造出适应于生产体系的消费欲望链条，最终将消费的享受功能转变为生产功能。同时，建立在心理基础上的这种生产—消费关联，由于受到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体制趋利逻辑的主导，势必带来增长的不稳定和社会失范等诸多问题。

2. 矛盾与冲突。这种生产消费体制与人的发展的矛盾也是明显的。第一，正如鲍德里亚（2015：95）所指出的那样：“人并不是拥有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人之为人的特性。……个人的价值体系，诸如宗教的自发性、自由、独创性等等都要在生产的维度上才能显现出来。甚至最为基本的功能也都立即成为体系的‘功能’。任何时候，人都不曾拥有基本的需要。”第二，资本主义体制从根本上忽视对个人发展的关注，还表现在以下方面：生产体系由于只是关注剩余价值，因此当面对它自身过度生产与效率下降的矛盾时，就会采取赤字、破产重构积累模式，这种工具取向的生产模式本质上与财富再分配和福利制度建设存在矛盾，由此，特权与消费大众的阶层对立难以消除，中产阶级上升通道受阻。第三，受传媒操纵的影响，消费大众与现实世界、

^① 关于加尔布雷思对利润最大化不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体制的原因的分析，请参见加尔布雷思（2012：125—135、161—172）。

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不再是利益、投资、责任的关系，而是好奇心的关系。消费异化和价值观念退化，使消费者变成从属于生产体系的生存者而非自主的自我实现者。

（四）罗萨：植根于当代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加速循环

罗萨吸收了吉登斯、贝克和鲍德里亚的思想，并在借鉴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及其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社会时间理论和社会加速理论。^①关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罗萨（2015：180—188）的基本认识是：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征是过程和事件的加速，就后福特主义时期的发展而言，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难题不是静态的分配，而是对加速循环的维护。技术加速、生活节奏加速和社会变化加速的相互推动，构成一个自我增强的社会加速循环，经济社会子系统的协调或同步是维持加速趋势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加速机制内生的分化和不确定，这个循环蕴含了失衡的可能，风险累积因此成为城市化集聚的主要特征。

1. 风险的集聚机制。罗萨（2015：189—230）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特有的时间经济法则的命令下运转。资本主义经济本质上是时间经济，在“时间就是金钱”的信条下，一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加速循环，取代了传统的为需要而生产的稳定模式。作为加速的物质基础，技术革命尤其是后福特主义时期所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确立了时间经济的高效率循环逻辑，因此，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技术逻辑就是时间逻辑。正是速度方面的革命，把工业革命引导得更为深入，加速循环是现代化的真正摇篮。进一步，当代高度现代化下时间价值的确认，不是出于单纯的经济必要性，经过了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规范重构的需要。加速逻辑基于不同历史、地理、文化环境下的改革、变化与重组，导致诸如莱茵式（长期效率取向）、盎格鲁-撒克逊式（短期效率取向）、亚洲式（日本模式）的变种。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变化的加速循环，通过三个层面的时间结构进行协调：日常生活的时间结构及其事件，如

^① 当然，关于技术加速以及社会流动所导致的问题分析，罗萨显然受到了芒福德和鲍曼的影响，但是他省略了两位作者关于社会价值的分析。这些被省略的思想，恰恰构成本文有关规范分析的重要部分，具体分析请参见下文。

工作、休闲之间的切换；生命时间或生命历程的时间结构及其事件，如入学、工作、婚姻、退休养老等；个体所处时代的时间结构及其事件，如代际、时代等。在此基础上的社会加速循环是：工业革命和数字革命在数量和速度上推动生活节奏的同时，也从质上推动社会形式的变革。技术、政治、教育、立法、市场组织和家庭等社会各环节，以循环的方式形成相互提升的关系，成为自我加强的反馈系统。这种整体上的社会加速的质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尽管技术和效率构成社会加速的物质支撑，但是，技术加速本身以文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为前提。资本逐利动机立足于技术决定论，并将其需求渗透到社会组织和社会价值的各个层面，日常生活的实质内容在不知不觉中被随波逐流的选择所替换，各类社会制度中对资本逐利的束缚被废除，去管制化、去制度化、去机构化等自由化改革都是为了去除加速循环障碍，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使这个过程被动终止。

2. 矛盾与冲突。显然，社会加速模型是建立在一个非常严格的假设上：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各种构成要素之间必须保持同步，资源、规则的结构组织必须满足协调运作要求。但是，这个假设在实践中很难得到满足，于是，加速的现代化本身蕴含了各种各样的分离、分裂和不确定，特别是后福特主义时代不断加剧的不平等、城市病和个体不安全感。总的说是，人的发展问题凸显。对于个人而言，加速导致职业流动和失业风险增加，同时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规划跟不上变化，个人发展的能动性受到抑制。对于社会而言，加速和持续变化的宏观环境导致劳资关系不稳定、传统家庭观念解体、社会群体分化以及代际断裂等，从权利和责任这个社会整合的基础来看，这些问题都不利于社会凝聚。同时，作为社会整合所必需的制度建设能力，也因为维持加速的要求而受到削弱，典型如政治机构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不得不动适应资本利益，造成了更大的社会不平等。不仅如此，国际上，发达国家自身的加速及其理念，经由分工传递给发展中国家，并导致这些在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出现了更加难以解决的城市病和不公平问题。

3. 补充说明。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关于集聚现代性的分析，与工业化理论中的集聚分析传统不同。受技术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主导，传统集聚主要囿于产业区位、增长极、城市经济等，麦卡恩（2010）指出，产业活动和人口集聚不是集聚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集聚的推动还应该考虑其他更多的

福利因素。尽管这种见识相对于前文所述观点仍然比较粗略，但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了。

三、均衡社会的四个准则

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社会加速及其所带来的诸多累积性风险，源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特有的逐利动机朝向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各个要素的渗透。这种工具取向的控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植根于资本主义的两个制度特点。第一，19世纪30年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把失业威胁带入现代化进程，并作为一种“自然法则”发挥作用（波兰尼，2017：139—140、176—182）；第二，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新现象，即加尔布雷思（2012：190—202）所谓丰裕社会中，一个人越是远离物质需要，他在购买时越容易被大众传媒说服或管理。由此，在职业竞争的同时，也产生了消费位置的竞争或区分。尽管每个人都试图适应和控制自身所处的环境，但最终都被裹挟进利益驱动的加速循环中。这种基于计算的工具理性，在当今城市化、经济服务化的环境中，正如 Bresser-Pereira（2017）所言，发达国家最终从商业企业资本主义演变成食利者—金融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这个时期的新自由主义，与19世纪30年代至二战期间的工业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更不同于传统福特主义那种包容性以及对社会稳定的追求。他进一步指出，本质上，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倒退，它的极端个人主义倾向和无约束竞争导致社会分化、不安全，而大企业、食利者、大资本家却从中渔利。这可视为对当代城市化集聚的利益取向的一个简洁概括。有趣的是，在这个极端的30年中，即使像英国和美国那样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社会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不仅没有明显下降，反而呈现缓慢提高的趋势。^① 不论这种提高是失业增加或不平等程度增加所致，还是其他社会政治因素所致，总之，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② 意义上的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试图抵消现代化自身带来的危害；同时，与利益动机同样

① 具体数据请参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数据库中的社会支出条目（OECD Data: social spending）。

② 亦有译为卡尔·波兰尼。

重要的城市集聚推动力也被呈现出来，即城市的公共性不仅是作为活动场所的公共性，更重要的是社会凝聚和制度保障意义上的公共性。因此，从利益与价值有机统一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本质上属于更加综合的经济社会一体化协调问题。但是，这种动态均衡的实现，需要满足四个基本前提，如图5、图6、图7、图8所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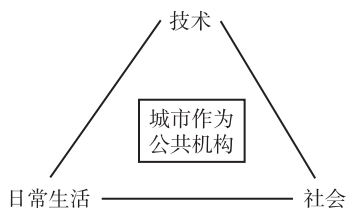


图5 芒福德城市化理论中的集聚与公共性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芒福德（2018）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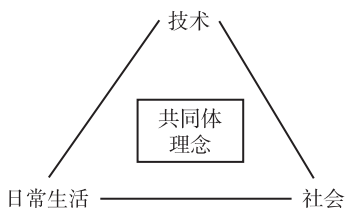


图6 鲍曼现代化理论中的集聚与共同体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鲍曼（2003）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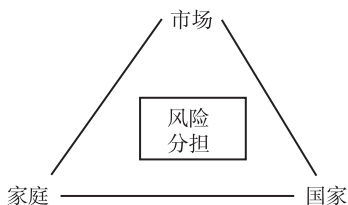


图7 福利组合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Rose（1986：24—30）和 Esping-Andersen（1990）绘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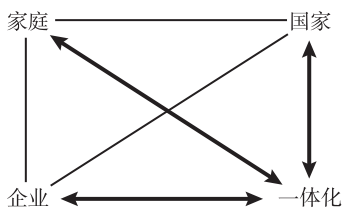


图8 经济社会四系统一体化机制

资料来源：袁富华（2021）。

（一）均衡社会准则之一：承认集聚的公共性和城市作为公共组织存在

通过大量史料分析，芒福德（2018：109、385—392、512—515）对城市变迁给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解释，并且抓住了社会文化规范变迁这个根本。起源上，城市首先是作为一套象征和价值系统存在，其规划和物质建筑长期作为文化价值载体存在；现代化上，城市商业属性的增强直至其最后成为主

^① 限于篇幅，我们拟在另一篇论文中对均衡社会给出进一步分析。本文的均衡社会概念框架体现在图8的规范主义理论框架下。

导,是由于16世纪之后资本主义发展所致,特别是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的兴起,把城市集聚当成追求利益的冒险事业,全力生产的功能取代了城市作为公共机构的职能。在这个过程中,与机械设备的广泛应用相结合,三类制度变迁极大地推动了工具、利益取向的最终确立。一是废除同业公会,人为创造不安全的就业环境;二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建立,促进了劳动力商品化;三是国际市场的开拓。城市集聚最终演变为出售城市。芒福德试图恢复城市集聚的公共性,在他看来,城市作为容器(贮存信息、文化)的功能,比作为磁体(个体、群体谋利场所)的功能更加重要。城市的首要特点是公共生活,这种被共同体、有机联系、社会规范等理念塑造出来的公共性,巩固了城市作为贮存财富、知识和文化的容器功能。由之,利益与价值的有机结合形塑城市“记忆”,并据此累积和更新社会活动,这是城市作为公共机构的价值所在。

关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芒福德重视城市集聚的公共性及其整合作用,他的思想明显带有传统社会理论的规范主义倾向,可以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①这涉及三个机制。第一,城市本质特征。城市应当是利益计算与价值规范的有机统一,这种一体化以城市文化聚合能力为前提。按照芒福德(2018:329)的说法,前资本主义历史中,典型如中世纪的城市发展,虽然缓慢,却是一种自觉维护共同体的耐心调整,是一种平衡的容器。然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破坏了城市平衡,技术和度量衡的进步把商品简化为抽象的积和量,对人造财富的追求替代了对人的发展的关注,利益关系置换了家庭与团体,城市集聚破坏了城乡共生关系。最终,商业化破坏了城市形态。第二,城市化与城市演化。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逻辑,城市发展方式变迁的根本标志是文化规范和价值规范的变化,城市演化有可能是进步的(即有利于有机发展的),也可能是退化的(即城市化走上利益取向,变成逐利的磁体)。根据芒福德(2018:389—392)的论述,现代城市与古代城市的区别在于:城市发展严格按照技术加速的节奏,未经社会充分引导,以快速步伐远离人文中心;或者说,现代城市的发展除了与科学、技术发展这一利益追求相关外,并不与其他目的相关。结果,旨

^① Heiskala (2007) 对于规范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梳理,Parsons (2007:421—440) 提供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最简明的介绍。

在实现社会安定的共同体价值被技术炸裂，在制动器失灵的情况下，城市变迁退化为杂乱无章、不可预知的状态。第三，社会化和制度化作为整合的重要机制。规范主义视角下的城市及其发展，应当是基于社会化和制度化的整合过程。按照芒福德（2018：515）的说法：有机发展能否实现，不是取决于各种因素的利弊，而是取决于城市对于各种因素的平衡能力，或者说是取决于城市应对自身矛盾和外部冲击的调整能力。针对这种能力的建设，制度化的作用在于建设和巩固有利于团结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社会化的价值在于通过制度建设，达成个体对于社会的认同。

总之，在芒福德（2018：497）看来，现代城市越来越被商业化为“金融业 - 保险业 - 广告业”三位一体，科学的精致追求与社会的滞后发展并存：如果沿着现在的路线继续发展科学技术，不改变前进方向，再持续一个世纪，会造成无法弥补的破坏。当前做法不是有意识创造一个比古代城市更有效的生存环境，也不是最大限度发挥人类潜力，而是消除特殊性、减少潜力，创造一个无思想的状态。

（二）均衡社会准则之二：承认集聚的社会性和城市作为道德共同体存在

当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理论中，鲍曼（2003：69—88）与前述各类思想处于同一知识体系。但是，正像芒福德那样，由于受到传统社会理论的影响，鲍曼更加有意识地去理解规范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表现。鲍曼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下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理解，他追随理想共同体那种自然而然的分享、信任、确定和安全感，但是却对现实存在的共同体感到不满，试图恢复城市作为道德共同体的这一本来面貌。由于问题分析聚焦于二战后福特主义时代与后福特主义时代的对比，因此，他的一些思想看起来具有较强的现实感，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1）现代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两个趋势。第一，用人为设计的各种规则和控制机制，取代理想共同体“自然而然”的理解。特别是工业化革命以来，基于自然的和传统调整的生活规则被改变，时间的结构和时间的质被赋予人为的现代性。用芒福德（2009：11—58）的话说就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城市居民在生活中养成了新的习惯、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式。第二，在新的权力框架内，创造一种共同体的感觉。这种状况在当代的典型情景表现在，用身份认同作为共同体的替代品，或者说用人为设计的、经过讨价还价的、不确定

的圈子替代自然而然的、默识的、确定的圈子。(2) 放松管制造就了无责任的失范时代。鲍曼(2003: 43)对二战后福特制所缔造的资本主义黄金三十年总体上是肯定的,就像他说的那样,福特主义试图综合上述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两种趋势,重建社会契约,并在机器控制、命令、利益与合作等矛盾之间寻找妥协与平衡。尽管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建筑在人为设计的制度之上,但是却创造了一种“伟大结合”。至少在安全感方面,依托企业内部的谈判与合作机制以及企业、家庭与国家三方伙伴关系,个体获得了相对稳定的就业与社会保障,风险分担和福利制度被视为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被视为对弱者的施舍。因此,社会防止不幸的集体保障更加接近于理想共同体特征,并提供了一种社会信任的基础。但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去管制,开启了“伟大分离”时代,成功者千方百计逃离社会责任,失败者被指责为无能力、懒惰。由之,以人际关系隔离、社会整合能力缺失为特征的“伟大分离”,最终导致了社会不公平问题加剧以及修正社会不公平的手段的匮乏。

关于个体(日常生活)、技术、社会三因素之间的关系,鲍曼(2003: 69—88)指出了有意义的区分,也就是美学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的区分。换句话说,当今实际存在的共同体本质上是一个相对的、易变的、基于身份认同的美学共同体,而不是于社会整合有助益的道德共同体。这是由去管制化对传统规范的破坏导致的,并造成各种失范。(1) 放松管制和去管制化的目的是巩固技术在社会中的决定地位,它们都是为后福特主义时代逐利机制开辟道路。在这一点上,鲍曼与前述各位作者的理解没有什么不同。他征引Goux(1990: 200—202)、布尔迪厄(2017: 417—508)等人的看法:资本主义如果要创造剩余价值,首先需要创造充足的欲望,对消费及其偏好的控制成为生产的前提。由之,新品味创造开始取代规范管制、监督,这种控制的实质就是打破传统规范的约束,其最终结果是过剩与浪费的再生产:逐利导致的生产供给过剩被浪费取代,过剩和浪费成为进一步扩大再生产的前提。一旦过剩成为规范,就没有什么是过分了的,当然,这是就生产控制消费的意义上来说的。(2) 去管制下的规范由利益主导,无论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还是对实际存在的共同体的追求,实质上都是以各种借口逃避责任,即自己对自己负责,自主选择但是后果自负。这一点上,鲍曼类似于前文所述Bresser-Pereira(2017)的认识:新自由主义是一种倒退,从失范的意义上讲,就是道德共同体退化为身份认同或美学共同体。(3) 两类共同体存在本质的不

同。第一，身份认同只是强调由思想或行为相似的个体组成的共同体，这种“共同性”的共同体，可以任意取消或放弃身份认同，解散与构建一样容易，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这种易变没有止境。鲍曼（2003：69—88）对此给出的例子是：娱乐业中的身份认同、美学共同体需要，其中，美学意义、名人效应是主导因素，体验、说服与偶像需要不断被创造。第二，与身份认同不同，道德共同体需要长期承诺。道德共同体建立在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责任之上，制度化、预期确定和安全感是其核心特征。在这个共同体里，对未来的规划和风险分担是一种承诺，保证其成员享有避免错误与灾难的共同体保障。典型如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保障体系，当然还有家庭、企业以及其他民间机构提供的保障。

对于社会规范和保障机制的建设，鲍曼（2003：93—94）认为应当在平等名义下表达再分配要求，这也是解决个体理性与社会发展矛盾的有效途径。承认个体平等参与社会互动的权利，把个体发展置于“社会公正”框架内，可以缓和自我维系的相互加剧的敌意。这是逆转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排斥、不确定和不安全感的重要机制。

（三）均衡社会准则之三：承认集聚的综合性和城市作为多元福利组合存在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放松管制，造成就业不安全、不平等的增加和经济对社会的脱嵌，2008年金融危机是这段时期发展失调的集中爆发。而且，逐利动机所造成的危害，进一步被经济服务化和老龄化所施加的不确定放大，于是，各国为应对风险而产生的自动的社会保护也内在地出现。实际上，这种反向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就已经出现，不仅是在发达国家，还包括拉丁美洲、亚洲等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这个反思过程中，欧洲高福利国家在尽力维护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社会安全理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利于未来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改革，广大发展中国家则不断拓展社会保护网。

在道德共同体的重构方面，福利国家理论坚持传统的规范原则：平等、正义、共同体、安全和信任构成社会团结的基础（Petersen, 2012）。这种一般原则不是福利国家体制发展的结果，而是控制自私冲动的基本前提。作为一种政治安排，福利制度应该惠及所有个体的基本需求，具有综合性、普遍性。在制度建设方面，各国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差异，导致不同福利组合模式产生，但是总体来看，其基本框架由国家、市场和家庭这三类制度互补而成；最近二三十年来，自由市场经济风险所激发的反向运动，也推动了民间福利

组织的发展,以弥补基本构架的不足。图7是基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福利组合模式(Rose, 1986: 24—30; Esping-Andersen, 1990),将合作社、互助组织、社团等“第三部门”的福利多元组合模型纳入这个基本框架内,Evers and Laville (2004: 11—42)对此进行了系统说明。对于福利组合模式及其扩展,简要说明如下:由家庭、市场(企业)、国家构成的福利组合模式,存在两层关系。第一,制度互补性。家庭作为自足的服务生产消费单位,提供照料服务;国家作为再分配的主要来源,提供制度化或财政化的服务,如教育、社会保障、医疗以及社会支持政策等。家庭-市场关系方面,主要是货币化的交换,典型如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的交换;家庭-国家关系方面,主要是权利、义务的再分配;家庭-市场(企业)-国家关系方面,主要是收入增长、税收调节、基础设施保障、效率维持等。第二,劳资谈判和妥协程序的嵌入,并据此形成利润分享的“家庭-企业-国家”三方伙伴关系,这是福特制的内核。三方伙伴关系的互补状况随着不同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变化,由此形成多种福利国家模式。根据 Esping-Andersen (1990: 26—29)的分类,典型如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社团主义的福利国家以及社会民主国家。^①

从社会权利确立的角度来看,福特主义把工业化与工人的政治参与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套有利于就业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对话机制。但是,由于这个时期迅速完善起来的社会保障提高了社会成本和生产成本,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最终使得传统福利国家模式难以为继。福利国家在转型过程中遇到了两难:一是后福特主义时期的经济自由化带来了更大的不平等和经济社会不稳定;二是为了应对宏观不稳定,发达国家不得不维持传统福利组合这个共同体内核,于是产生了效率-福利动态平衡的路径探索。为此,以新组织面貌快速成长起来的合作社、互助组织、社团等“第三部门”自动嵌入于传统福利组合,以求得在不伤及效率的前提下,弥合社会团结缺失的机制和环节。第三部门的成长丰富了多元伙伴关系,其重视个体的“公民”身份而非纯粹的交换关系,^②从而有利于实现多种经济社会目标平衡,增强社会凝聚力和个体安全感。

① 相关论述请参见袁富华和李兆辰(2021)、袁富华(2021)。

② 请参见佩鲁(1987: 8)的一个类似观点:以当代各种经济学为基础的“哲学”反映了一种交易心理,这种心理破坏了人们之间的伙伴意识,随之破坏了一切哲学和宗教的,尤其作为人性来看待的价值观念。

（四）均衡社会准则之四：效率、效能与一体化

这个准则是从社会治理角度来讲的。图 8 来源于袁富华（2021），此处为了突出治理准则，我们只关注福利组合中经济社会整合或一体化的含义。为此，我们回归到利益取向、社会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中，鉴于工具理性或逐利动机具有风险累积的危险倾向，长期中，可将社会发展视为抵消经济脱嵌危害的重要途径。对于福利组合的一体化治理，本文简要提示三点。

表 1 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及发展阶段

形式	时期	发展阶段
发展型资本主义	16—18 世纪	重商主义(发展主义第一阶段)
	1940—1979 年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 (发展主义第二阶段:社会发展型资本主义)
自由资本主义	(1929—1940 年)	危机与过渡
	1834—1929 年	产业资本主义
	1979—2008 年	食利者 - 金融家资本主义
	(2008 年至今)	危机与过渡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Bresser-Pereira（2017）整理。

1. 社会价值或者文化规范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主要标志。这是规范主义的基本观点，也属于社会理论中的发展主义观点。对此，我们可以继续征引前文提及的 Bresser-Pereira（2017），其贡献是把长期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分为两类范式和四个阶段，如表 1 所示。两类范式是发展型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这种范式区分就是基于文化规范的差异。四个阶段分别归属于两类范式。（1）发展型资本主义包括了第一阶段的重商主义和第二阶段的后福特主义，黄金时代的社会保障、安全和确定成为怀旧的象征。（2）自由资本主义包括了早期产业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时期的食利者 - 金融家资本主义。虽然都被记在自由主义的名下，但是这两个阶段的范式不同，更别谈与黄金时代的制度差异了。尽管植根于趋利动机之上，第一阶段的自由主义由产业发展提供基础。并且就像波兰尼（2017：198—202）所说的那样，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冲击，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内在地生成，这个时期也是政治权利和

社会权利的确立时期。但是，后福特主义时期的自由主义退化为由金融家和食利者主导，去管制化导致经济脱嵌于社会，其后果集中表现为2008年金融危机。危机之后，世界各国试图重塑有利于效率-福利平衡的价值体系，传统道德共同体的复归及其适应性改造正为各国付诸实践，发达国家努力方向在于建设瞄向未来的福利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试图进行更加综合的、整体的、内生的新发展主义实践（佩鲁，1987：180）。

2. 整合或一体化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核心。这种规范主义认识，是对于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连续和稳定的维持来说的。作为现代化的动员力量，城市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整体社会发展，这是不言而喻的。关键在于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实现协调的均衡或稳定，并以此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持续提升的动力。就连续和稳定来说，社会理论的一个良好传统，在于重视社会规范的价值取向与纯粹工具化的利益追求的有机统一，因此，均衡社会的参照点是规范模式的维持。就发展来说，城市化以人的发展和良好社会组织的不断完善为标志，信任、平等、民主、秩序、增长可持续等一系列更高质量的社会价值，在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以此获得社会凝聚力。一体化的主要功能，在于保持子系统之间和子系统内部的有机统一，据此达成共同体。关于如何运用法律、文化、中介组织促进家庭、市场、国家之间整合的机制，袁富华（2021）指出：第一，通过制度化和社会化，形塑特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典型如法律体系、社会保障体制、劳动市场体制的完善等；第二，通过中介组织的发展，弥补市场、非市场（国家）和非货币（家庭）制度的缝隙，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稳定、连续；第三，鉴于制度化与中介组织自身的规范、团结特征，一体化有助于推动分享与合作机制的巩固。

3. 效率、效能是治理的关键。具体到治理实践领域，要想使协同发展得到落实、社会价值内部化于个体，就应当解决认同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曾毅，2011）。这实际上是强调国家的能动性。关于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方面，国家应该有能力保障个体的就业安全、政治参与和分享权力，并使个体从所尽义务中体现其个人价值，让个体既有获得感又有成就感。在国家与市场、家庭的协同过程中，效率或者说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就业增长等，是政府治理效能的体现。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得益于高效率的行政组织与决策机制，就当代风险集聚的特征而言，为应对更加复杂

的干扰和冲击，要求政府对社会的嵌入，以增加应对问题的灵活、综合和前瞻能力。

四、结论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工业化的巨大成功，一度使得技术决定论、经济决定论在理论和实践领域得到更加广泛的巩固和传播，^①但是，由此导致的风险累积、宏观不稳定和不安全，也激发了对现代化问题的深刻反思，于是，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社会决定论、文化决定论相应得到发展。这种思想的反向运动旨在揭示信任、公平等古老社会价值之于发展可持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面对现代化过程的累积风险时，都不得不完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政策、更新哲学认识。尽管当代社会理论已经认识到社会发展是活力之源，是内生动力培育的基础，但是我们仍然认为，在看待现代化过程的联系时，应当坚持经济与社会的有机统一，而技术决定论或社会决定论的任何片面倾向都是有问题的。

参考文献：

- 阿尔都塞，路易，2019，《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
- 鲍德里亚，让，2014，《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鲍德里亚，让，2015，《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夏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 鲍曼，齐格蒙特，2003，《共同体：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 贝克，乌尔里希，2004，《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
- 波兰尼，卡尔，2017，《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布尔迪厄，皮埃尔，2017，《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上），刘晖译，商务印书馆。
- 吉登斯，安东尼，1998a，《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吉登斯，安东尼，1998b，《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李猛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① 关于这个主题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李三虎（2003）。另，对经济主义更加深入的批判和反思，请参见阿尔都塞（2019：397—433）。

- 加尔布雷思, 约翰·肯尼思, 2012, 《新工业国》, 嵇飞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李三虎, 2003, 《技术决定还是社会决定: 冲突和一致——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理论》, 《探求》第1期。
- 罗萨, 哈尔特穆特, 2015, 《加速: 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 董璐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 麦卡恩, 菲利普, 2010, 《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李寿德、蒋灵全译, 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 芒福德, 刘易斯, 2009, 《技术与文明》, 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芒福德, 刘易斯, 2018,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与前景》, 宋俊岭、宋一然译, 上海三联书店。
- 佩鲁, 弗朗索瓦, 1987, 《新发展观》, 张宁、丰子义译, 华夏出版社。
- 袁富华, 2021, 《分享与人的发展: 规范化理论视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第1期。
- 袁富华、李兆辰, 2021, 《嵌入、调节与治理: 历史时间与现代化路径》, 《经济与管理评论》第2期。
- 曾毅, 2011, 《比较政治研究中的发展主义路径》, 《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
- Bresser-Pereira, Luiz Carlos. 2017. "The Two Forms of Capitalism: Developmentalism and Economic Liberalism." *Brazi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37 (4): 680 - 703.
- Esping-Andersen, Gøsta. 1990. *The 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vers, Adalbert, and Jean-Louis Laville. 2004. "Defining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In *The Third Sector in Europe*, edited by Adalbert Evers, and Jean-Louis Laville, pp. 11 - 42. Cheltenham/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 Goux, Jean-Joseph. 1990. *Symbolic Economies: After Marx and Freud*, trans. by Jennifer Curtis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Heiskala, Rist. 2007. "Economy and Society: From Parsons through Habermas to Semiotic Institutionalism."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46 (2): 243 - 272.
- Parsons, Talcott. 2007.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System." In *Classical Sociological Theory*, edited by Craig Calhoun, Joseph Gerteis, James Moody, Steven Pfaff, and Indermohan Virk, pp. 421 - 440. Malden, MA/Oxford, UK/ Carlton, Victoria: Blackwell Publishing.
- Petersen, Jørn Henrik. 2012. "A Normative Theory Concerning the Welfare State and Its Inherent Dilemmas." Accessed October 24, 2021. http://www.eurashe.eu/library/modernising-phe/EURASHE_AC_Riga_120510-11_pres_PETERSEN.pdf.
- Rose, Richard. 1986. "Common Goals but Different Roles: The State's Contribution to the Welfare Mix." In *The Welfare State East and West*, edited by Richard Rose, and Rei Shiratori, pp. 13 - 39.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Modernity of Agglomeration and the Criterion of a Balanced Society

Yuan Fuhua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Based on several representative texts of social theories that shares the same knowledge system, this article give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of agglomeration modern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society. Different from the principles of sharing, trust, certainty, and security of Fordist period, the high modernity of the post-Fordist period dominated by deregulation and interest motives led to the de-embedding of the economy from the society. Thus, the traditional logic of wealth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gave way to the one that bases on social risks, and brought insecurity and unsustainability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risk society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future-oriented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vitality, which is one of the main element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shape social value norms and social solidarity mechanisms.

Keywords: Agglomeration, Modernity, Risk, Norm, Balanced Society

JEL Classification: H40, I30, P20

(责任编辑: 倪诗妆)